

● 语言哲学

## 维特根斯坦的梯子： 语言哲学视阈中的斯泰因和贝克特<sup>\*</sup>

荆兴梅

(江南大学, 无锡 214122)

**提 要:** 本文以《维特根斯坦的梯子》为基石, 探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渊源。首先, 维特根斯坦借助语言的中介作用洞察哲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哲学性, 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都可以解读成典型的后现代文学文本。其次, 斯泰因的诗学体系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那样, 试图解除某种形而上的困惑, 她将众多双关语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上, 经由文字游戏解决哲学难题或实行文化干预, 如颠覆未来主义学派的战争观和性别观。最后,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也渗透到贝克特的小说中, 使后者一方面强调语境对于词语意义的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设置众多叙述迷宫和语言困境, 以此告诉人们: 语言最有效误用之时, 也即语言最有效运用之时。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语言哲学; 斯泰因; 贝克特; 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013-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06

### Wittgenstein's Ladder:

### A Study of Works by Stein and Becket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Jing Xing-mei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Based upon *Wittgenstein's Ladder: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 by Marjorie Perloff,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over the bond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aking language as the medium, Wittgenstein explores poetic nature i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in literature 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and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that can be considered as postmodern texts. Like Wittgenstein, Stein attempts to dissolve metaphysical puzzles and carry out cultural intervention by puns in which Futurists' views on wars and gender are subverted. Beckett's fiction in Wittgenstei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tresses 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 Meanwhile, Beckett designs narrative labyrinths to make it clear that language is most efficiently used where it is being most efficiently misused.

**Key words:** Wittgenste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tein; Beckett; postmodern

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的文学语言一向标新立异, 尽管与她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 却给后人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而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在写作实践和语言革新方面同样特立独行, 常常借助语言危机来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学界关于这两位作家的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 但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角度审视其人其作的学者却并不多。本文立足

于当代美国诗学家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 1931-)的著作《维特根斯坦的梯子》, 探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渊源。首先, 维特根斯坦借助语言的中介作用, 洞察哲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哲学性, 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都可以被解读成典型的后现代文学文本。其次, 斯泰因的诗学体系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那样, 试图解除某种形而上的困惑, 她将众多双关语建立在日常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城市化主题研究”(14BWW068)的阶段性成果。

语言的基础上,经由文字游戏来解决哲学难题或实行文化干预,如颠覆未来主义学派的战争观和性别观。再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也渗透到贝克特的小说中,使得后者一方面强调语境对于词语意义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设置众多叙述迷宫和语言困境,以此告诉人们:语言最有效误用之时,也即语言最有效运用之时。

### 1 维特根斯坦理论的诗性建构

《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在学界扬名立万的基石,这两本书的语言哲学意义人所共知,其诗学价值却只有少数学者问津。伊格尔顿认为,弗雷格是哲学家眼中的哲学家,罗素是店主眼中的圣人,萨特是媒体眼中的知识分子,而维特根斯坦是跻身于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中的哲学家。在他重量级的《逻辑哲学论》中,很多篇章都曾将音乐设置为背景(Eagleton 1987: 5)。伊格尔顿受到维特根斯坦作品诗性特征的启发,曾经写过一部名为《圣人与学者》(*Saints and Scholars*)的幽默小说。故事中的维特根斯坦逃离封闭而伪善的剑桥,和他的朋友们——其中之一是俄国侨民和语言哲学家尼古拉伊·巴赫金,也是文论家米哈伊·巴赫金的兄弟,在爱尔兰海滨租下间村舍一起居住。维特根斯坦锋芒毕露,是这个团体中名副其实的激进分子,他大谈特谈“革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并对眼前形势做出精确估量。《圣人与学者》仿佛陷入维特根斯坦诗人气质的魔咒,一任维特根斯坦在其中滔滔不绝挥斥方遒(同上: 112-113)。

《逻辑哲学论》采用跳跃性和非线性写作模式,精心营造出双层结构,使得显文本和潜文本并行不悖。维特根斯坦这本语言哲学著作动笔于一战前,它表面上事关数理逻辑,而无关于形而上学思维。然而,一些学者却能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解读出意味深长的潜台词,使得该书从原来的逻辑科学专著演变成先锋诗学小说。比如文本中相继呈现以下两条命题“所有命题都具有同等价值”(All propositions are of equal value)和“世界的意义必须存在于世界之外……”(The sense of the world must lie outside the world...).显而易见,上下命题之间缺乏关联和逻辑,致使突兀性跃然纸上,造成文本的断裂和空白。同时,人们禁不住深感疑惑:既然文本的意义存在于世界之外,那么我们又要如何行事,才能预测世界之内到底存在什么?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重回剑桥教授哲学时,对罗素已有成见。他让学生阅读罗素的数理逻辑书,而禁止他们接触罗素的伦理和政治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所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如生命、伦理和宗教等)都是不可说的,它们同等重要,分别存在于世界内外。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罗素等人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不可说之物,理应被归类为“冒牌货”

(fraud)(Perloff 1996: 45)。可见,《逻辑哲学论》的潜文本信息丰富、作用巨大,它将语言哲学从形而上学层面转移到现实场景和日常运用中,悄悄填补显文本中的叙述空缺。从这个层面讲,《逻辑哲学论》和后现代文学文本如出一辙,都打破传统的因果关系和线性陈述,邀请读者参与文本的建构和阐释,从而赋予读者以主观能动性。正如评论家所言:本书命题间的关联性严重缺失,貌似为败笔,但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却变成诗学能量的神奇源泉(同上: 47)。

《哲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后现代诗学特征,与《逻辑哲学论》可谓一脉相承。维特根斯坦写作《哲学研究》历时整整16载(从1929年到1945年),是一个笔耕不辍又不断修正的创作过程。一方面,他反复从同一个语料库里抽取资料,不断修改例词和例句,以便达成意义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他发明一种研究哲学的新方法,使得哲学不再那么绝对和纯粹,而是呈现出诗学的样貌(同上: 65)。首先,《哲学研究》文本充斥着种种文学隐喻,使其本身成为诗意的语言游戏场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工具箱(tool-box),声称语言就像里头的各种工具,发挥着多样化的功效。他还把语言描绘成一座古城(ancient city),里面街道广场纵横交错,古今建筑错综复杂,完全是一座迷宫(同上: 68)。类似的隐喻不胜枚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调语言游戏的日常性和重要性。其次,《哲学研究》反对阐释、理论化和系统化等学术行为,坚持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在阅读体验中的相似性。费什认为,文学是阅读方式的产物,即读者群就文学价值达成共识并上升至理论(Fish 1980: 97)。对于费什推崇的“阐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维特根斯坦很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人们庸人自扰,导致私密性的阅读快感大幅度减少。再次,维特根斯坦的种族、性别和文化身份等重要线索都在《哲学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被解读成自传或日记是有迹可循的,尽管它的忏悔内容无法与奥古斯丁和卢梭相提并论。维特根斯坦具有四分之三犹太血统,这让他提及“异邦”(foreign country)和“异邦传统”(foreign traditions)时不单单指他和英国之间的疏离感,还指维也纳对于他这个犹太人的漠视。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取向也可以在《哲学研究》中找到蛛丝马迹。通过“我的预测和别人对我的预测并不相同”等论调,他仿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以此掩盖隐情。维特根斯坦的流亡经历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脉络,因为只有当某人浪迹天涯时,才会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说出“语言游戏是最初的家园”(Perloff 1996: 76)。

维特根斯坦著名的“梯子”隐喻出现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页。帕洛夫如此来解读它的诗学特征:其一,这架梯子具有日常语言的性质,它的词源和语用目的都处于不确定状态;其二,爬梯子的过程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如同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强化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体系化和理论化的质疑;其三,一个人无法两次爬上同一架梯子,每个哲学命题都与其他命题有不同,即使同样的词汇用同样的次序加以重复,这种重复也在具体使用中悄然发生变化(同上:IV)。上述分析可谓一语中的:维特根斯坦借助语言的中介作用,洞察到哲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哲学性,从而在他的语言哲学王国里能够“诗意地栖居”。

## 2 斯泰因的“双关语”游戏

斯泰因和维特根斯坦从未谋面,她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两者之间却有很多相似和交汇之处。第一,两人都是同性恋者,都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斯泰因从美国流亡到法国,追寻文化和身份自由;相对英国来说,维也纳清规戒律较少,但剑桥更适合深居简出的私生活,维特根斯坦便将剑桥当成庇护所。第二,流散经历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异质性和杂糅性。斯泰因既与英语保持距离,又游离在法语之外,令她的写作进入“第三种”语言形态(a third language);维特根斯坦的学术成果多由其学生从他的剑桥讲座整理而成,因此,其中包含英语和德语两种文化和语言基础。第三,两者都热衷于探索语言游戏,与语言的关系非同寻常。也许正是性取向和民族身份的双重束缚,为他们开启另一扇窗,让他们专注挖掘语言的微妙差异,并获得累累硕果从而功成名就。

斯泰因曾经写过一首散文诗《和尼提结婚》,就让它成为系列并叫作“和尼提结婚”(Marry Nettie, Alright Make It a Series and Call It Marry Nettie,以下简称《和尼提结婚》)和她那些公认的名篇相比,未免相形见绌。然而这首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却和《哲学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个短小精干的命题,貌似都由十分普通的语言构成,呈现出非线性性和不关联的特质,却蕴含着精妙绝伦的意义。它将斯泰因的语言游戏演绎得出神入化,颇值得人们对其重新评价和定位。20世纪初,未来主义艺术家在巴黎举办画展,并引起不小的轰动,而马里尼提(Marinetti)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马里尼提崇尚战争武力和激进诗学,在作品中将它们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斯泰因使用一种间接而曲折的方式将自己对未来主义的回应编织进诗歌。从现代主义文学的角度来看,《和尼提结婚》是斯泰因反对未来主义创作观的宣言(counter-Futurist manifesto),差异性和颠覆性都隐匿在机智的表象下面。诗歌的题目Marry Nettie和激进艺术家名字Marinetti形成双关语,开篇就造成一种调侃和讽刺的张力,矛头直指战争、暴力和性解放等未来主义言论。马里尼提喜欢用一连串铿锵有力的名词来勾画一系列自然流畅的新意象。斯泰因对此不无奚落之意,她对名词串连而成的并列结构弃之不用,而是改用简短、非线性的构造,令句子的语

法前后不同。斯泰因实则在拆解并重组词汇,她在摧毁句法方面做得比马里尼提有过之而无不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认为,语法只是描述符号的使用,并不做任何解释(Wittgenstein 2009: 496)。言下之意在于:语法只在某种语境下服务于传情达意,至于它是否完全合乎规范,人们可以不必深究。斯泰因用这种“不合规范”的句法暴露马里尼提诗歌中存在的问题,以此瓦解未来主义写作纲领。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斯泰因借由《和尼提结婚》这首诗反对未来主义诗学倡导的战争暴力。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都可以被解读为“战争之书”(war book),是战争幸存者对生活光明一面的看法(Perloff 1996: 46)。斯泰因和维特根斯坦颇为相似,生命历程也贯穿两次世界大战,她的《和尼提结婚》以一战期间的巴黎为背景,同样表达对于战争和生命的理解。该诗第一句“原则在召唤”(principle calling),从字形上和principal形成双关语,意指马里尼提是未来主义学派当仁不让的主要领导者;从字义上呼应马里尼提的宏伟宣言,即战争是“光荣和洁净的”。斯泰因在此处采取“同谋性批判”策略,用马里尼提自己的言词来消耗他的语言合理性。她表面上似乎在迎合他,实质上以隐晦的方式极尽讽刺之能事,让他自揭其短、自我解构。所以接下来的句子“他们不结婚”(They don't marry)立刻让人联想到浴血奋战的士兵:他们死去了,所以不会结婚。这样,斯泰因对于战争的态度便一目了然:战争既不光荣也不洁净,而是等同于幻灭和死亡,因此人类应该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从而永久生活在美好和平的世界中。

从个人生存体验的角度看,《和尼提结婚》揭开未来主义诗学的父权制面纱,试图确立斯泰因女同性恋者的合法身份。这首诗的某些内容,与斯泰因的《爱丽丝·托克拉斯自传》(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有相似和交集之处,都在与主流社会的父权制抗衡,捍卫她与爱丽丝惊世骇俗的同性恋婚姻。文本描述道“我们从一个男人手中买到电风扇。”这里的“我们”(we)指涉女性群体,“扇子”(fan)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中常常是女性身份的象征。女性从男性手中获取电风扇的所有权,意味着女性最终获得主体性,同性恋就是其中极富代表性的行为。同时,未来主义作品曾大力歌颂电(electricity)的威力,凸显男性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强势地位,此处电风扇被女性据为己有,恐怕男性的科技精英形象再无立锥之地。这一场景仿佛扇了马里尼提一记耳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来主义诗学自负傲慢的本质。临近结尾处,文本语言再次和Marinetti形成双关语游戏“和谁结婚?和尼提结婚。哪个尼提?我的尼提。娶谁?娶尼提,娶我的尼提。”未来主义学派的首领马里尼提就这样被两位正在对话的女性替代。她们堂而皇之地谈论着性自由,宣告

脱离父权制的影响和掌控,从而强化同性恋行为的合理性。斯泰因的诗学体系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一样,都试图解除某种形而上的困惑,而这种迷惑和困境都呈现在形而下的语言中。他们认为,语言迷宫喻指哲学和社会等问题,而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之上的文字游戏往往是他们解决哲学难题或实行文化干预的有效手段。

### 3 贝克特的语言“误用”

贝克特的代表作《瓦特》和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颇有渊源。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分完成于1945年,也就是在这一年,贝克特正在给小说《瓦特》收尾,他在战争年代藏身法国南方多年,此时已经回到巴黎。更为巧合的是,这两部日后的名篇佳作虽然都创作于二战期间,但都绵延至1953年才得以出版。《哲学研究》最终以遗作的形式问世,是因为维特根斯坦不断添加书稿内容,以至延误先前承诺的交稿日期。而《瓦特》则是因为伦敦和纽约等地的书商无一例外都将它拒之门外才导致迟迟难以付梓(Lake 1983: 75)。《瓦特》最终为当时以发表色情读物而著称的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Olympia Press)接受,足见这部后来闻名遐迩的小说当年在出版界曾遭受过怎样的冷落(Perloff 1996: 115)。

《瓦特》这本书的写作历程与贝克特二战期间的经历不谋而合。在1947年他给朋友利维(George Reavey)的信中,贝克特这样评价《瓦特》:“此书不一定令人满意,因为它是断断续续完成的:我先是在逃亡途中写,接着在夜晚写,在遭受野蛮待遇之后写,巴黎被占领期间我依然在写。尽管如此,它在我的系列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总有一天会与读者见面。”(Lake 1984: 75)依照雷克(Carlton Lake)的描述,在贝克特关于《瓦特》的6本笔记手稿中,第一本写道:星期二晚上开始写作,41年2月11日;第二本的首页注明日期:41年3月12日;第三本是“41年5月5日”;第四本标注着“可怜的约翰尼/《瓦特》/鲁西永(Roussillon)”,时间是“1943年10月4日”;贝克特在第五本的封面上记载“《瓦特》第五章/随后的部分和结尾/45年2月18日/巴黎”(同上:75-76)。由此可见,《瓦特》的创作涵盖贝克特至关重要的5年岁月:从1940年10月他参加巴黎抵抗组织,到1942年夏天他逃脱盖世太保魔爪前往沃克吕兹(Vaucluse),再到1945年停战8个月后他返回巴黎。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德国军队入侵巴黎后,贝克特与乔伊斯一家都加入逃难大军。而在法国小镇鲁西永,贝克特隐姓埋名并像农民一样辛勤劳作,以此换取酒和土豆等生活必需品。他在1943年还曾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为了达到缓解心理焦虑的目的,他选择在每天晚上写作《瓦特》(Perloff 1996: 123-125)。

《瓦特》秉承贝克特的一贯思想,强调语境对于词语意义的重大作用。文本中语言表述的荒诞性俯拾皆是,

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尼克森夫妇走过来,“他(哈克森)收回双臂(called in his arms),他们便坐在他的身旁。”此处字面的荒诞意味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人们将双臂垂于双侧是自觉行为,缘何会愚蠢到以“收回”相称?维特根斯坦也论及如“意愿的本质(the nature of willing)”问题:“当我自觉举起手臂,事先并未希望它抬起,这个自觉行为与意愿无关;我不需要等待我的手臂抬起,我可以举起它”(Wittgenstein 2009: 612-616)。可见,《瓦特》中的哈克森很不希望他人侵入自己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所以才不情不愿地“收回双臂”。这个词表面荒诞不经,实际上相当意味深长,再一次印证贝克特小说的深邃主题,即理性个体不断遭受荒诞世界的嘲笑和凌辱。维特根斯坦对于意愿本质的阐述,实际上是在间接地重申他的著名论断:词汇的意义存在于语言使用中。假如内科医生检查病人扭伤的手臂,并命令病人伸直手臂然后放下,“病人收回手臂”的说法倒还可以成立。如果这个短语置于战场语境中,意指“收回武器”(calling in one's arms)这样的表达也算得上完美无瑕(Perloff 1996: 119)。维特根斯坦曾在剑桥做过美学演讲,他认为“好”(good)和“美丽”(beautiful)等词并无实质意义,重要的是这些词被说出时的场合(occasion)以及它们被放于何种用途之中(同上:51)。也就是说,美学和词汇都绝缘于本质主义,它们都并非天生具有意义,而是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永远携带着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印记。因此,人们只有将语言放置到具体语境中语言才具备内容和含义。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早在当代文化理论盛行之前,维特根斯坦就断言自我是社会建构之物——当我审视最隐秘的感情时,之所以认同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因为我能够驾驭一种语言,一种属于我之前早就具有社会性的语言”(Jarman 1993: 10)。

贝克特在《瓦特》中设置众多叙述迷宫和语言困境,他用这种方式向人们传达一个重要观念:语言最有效运用之时,也即语言最有效运用之时。哈克特问尼克森与瓦特第一次碰面的情形,于是一场有趣而荒唐的谈话随即展开: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他,他正光着一只脚(one of his feet),而我也忘了究竟是哪只。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急需5先令给自己买只靴子,我只能答应。哈克特不解地说:一只靴子(boot)无法买到。尼克森夫人说:也许他知道到哪里去量尺寸(Beckett 1976: 21)。瓦特当时光着哪只脚?他既然无法买到一只靴子,为何需要钱?人们又如何获得一只靴子,而不是一双?Feet和boot都具备多重含义,很容易引起误解和歧义,以上3个人物对这两个词汇的意思了如指掌,却理不清它们在句子中的具体意蕴,因而受困于交际和理解障碍无法自拔(Perloff 1996: 120)。这场谈话的荒谬性暴露无遗,却能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找到很好的注解“就好像一份移交到

我手上的书面奶牛订单,必须附以奶牛的画像,才不至于引起误读”(Wittgenstein 2009: 449)。维特根斯坦想要阐明,语言和语境很容易形成错误配置,进而导致表征危机和沟通失效。语言是幽径,你从某处向前,就明白如何通行;你从另一处前往同一地点,就会迷路(同上)。《瓦特》文本中到处充斥着类似的语言迷局,那么贝克特的用意到底何在呢?在1937年写给一位德国朋友的信中,贝克特这样解释自己在叙事中的良苦用心:“对于我来说,用官方英语写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没有意义。英语之于我就像一块面纱,必须撕掉它才能获取本质的东西(或者虚无);语法和写作风格颇似维多利亚时代的游泳衣或绅士派头,完全是假面具。‘语言最有效误用之时,也即语言最有效运用之时’,让我们希冀这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的时代快些降临,感谢上帝,有些领域中这样的时代其实已经到来”(Beckett 1984: 171-172)。贝克特当时对官方英语不屑一顾,并非意气用事之举,而是厌倦它那随处可见的陈词滥调,以及英语文学对细枝末节的模仿和跟风态度。他希望借助非主流和非官方表述样式来消解语词表面的物质性和庸俗性,从而探索语言的本质成分。这种探索并非像乔伊斯那样对词语的借喻和听觉特质顶礼膜拜,而是要像斯泰因那样允许一些“非词”(un-word)因素闯入文本的字里行间。这些“非词”包括笨拙、普通或缺乏诗性的用词、短语和句子,以及突兀的停顿和诡异的沉寂,等等(Perloff 1996: 121)。就连《哲学研究》这样的理论著作也无法建立整体性和规范性,文本内的临时性和跳跃性赋予它很多“非词”和他者性特点。维特根斯坦自认为这本书不能有线性结构和有机统一模式,“突变”是它的主要纹理(Wittgenstein 2009: 24)。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克特和维特根斯坦的写作策略一脉相承,都对主流语言体系发起质询和挑战。

贝克特充满革新和突破的后现代叙事手法揭示一个荒谬而黑暗的现实世界。“我们时代的黑暗”(darkness of our time)这一指称是评论家们对贝克特小说主题达成的共识,也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前言提及的内容。库西诺称其为“正在异化的文化”(alienating culture),认为它让公众处于虚假意识之中,使主体性受到压制和扭曲,以至于人类和动物的生命被迫沦落到蔬菜状态(vegetable level)(Cousineau 1993: 64)。的确,贝克特笔下的人物大多显得机械而原始,呼应着奥斯维辛大屠杀之后的生命存在状态,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动荡和身份异化的生动写照。

#### 4 结束语

早在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研究》的相关命题之前,斯泰因就写出关于语言游戏的先锋诗。斯泰因秉持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日常语言建构,并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与语言世界保持对话关系。而贝克特的生活发生剧变,皆因二战爆发和德军入侵巴黎,这些促使他加入抵抗组织成为密码传递者。贝克特后来不无讽刺地发现,他的文学使命与官方间谍工作性质相同,两者都是关于信息转换的语言问题学。在面对语言和哲学的关系时,维特根斯坦、斯泰因和贝克特跨越漫长的时空隧道而达成惊人的默契:人们无法撕碎语言的面纱抵达世界真相,因为并非一组词比其它词来得真实,而是一切取决于它们如何被安置。

#### 参考文献

- Beckett, S. *Watt* [M]. London: John Calder, 1976.
- Beckett, S. *Disjecta: Miscellaneous Writings and a Dramatic Fragment* [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4.
- Cousineau, T. *Watt: Language as Interdiction and Consolation* [A]. In: Gontarski, S. E. (Ed.), *The Beckett Studies Reader* [C].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3.
- Eagleton, T. *Saints and Scholars* [M]. London: Verso, 1987.
- Fish, S.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Jarman, D. *Wittgenstein: The Terry Eagleton Script, the Derek Jarman Film* [M].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3.
- Lake, C. *No Symbols Where None Intended: A Catalogue of Books, Manuscripts and Other Materials Relating to Samuel Beckett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1984.
- Perloff, M. *Wittgenstein's Ladder: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1996.
-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2009.

定稿日期: 2015-10-03

【责任编辑 谢群】